

中国現代教育史 教學參考資料

教育史教研室 編

吉 林 師 范 大 學

一九六二年·長春

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生与发展

第一部分 毛澤东同志的著作

毛澤东：新民主主义論

(1940年1月)

(見《毛澤东选集》第二卷，第655—704頁。

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)。

毛澤东：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

(1942年5月)

(見《毛澤东选集》第三卷，第849—880頁。

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)。

第二部分 李大釗、惲代英、楊賢江的著作

李大釗：劳动教育問題

(1919年2月)

現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帶着 *Democracy* 的顏色，都沿着 *Democracy* 的軌轍。政治上有他，經濟上也有他；社會上有他，倫理上也有他；教育上有他，宗教上也有他，乃至文學上、藝術上，凡在人類生活

中占一部位的东西，靡有不受他支配的。簡單一句話，*Democracy* 就是現代唯一的權威，現代的時代就是 *Democracy* 的時代。戰後世界上新起的那勞工問題，也是 *Democracy* 的表現，因為 *Democracy* 的意義就是人類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機會均等。勞工們辛辛苦苦生產的結果，都為少數資本家所壟斷，所掠奪，以致合理工作的生產者，反不得均當的分配，斷斷非 *Democracy* 所許的。應該要求一種 *Democracy* 的產業組織，使這些勞苦工作的人，也得一種均等機會去分配那生產的結果。不但這個人類的生活，衣食而外尚須知識物的欲望，尚有靈的要求；一個人汗血滴滴的終日勞作，靡有工夫去發揚他的知識，陶養他的性靈，他就同機械一樣，牛馬一般，久而久之，必把他的人性完全消失，同物品沒有甚麼區別。人但知道那些資本家奪去勞工社會物質的結果，是資本家莫大的暴虐，莫大的罪惡，那知道那些資本家奪去勞工社會精神上修養的工夫，這種暴虐，這種罪惡，却比掠奪他們的資財更是可怕，更是可惡！現代的勞工社會已竟漸漸覺醒，我們常常聽見他們有“一日工作八時”、“一周工作四十時”、“假期休工不停給”種種的要求。這種要求，在我們游惰性成的社會，必要是更表同情。可是他們的同情，未必和人家這種要求的本意一致，必以為少做點工，豈不快樂，那曉得這省出來的一點時間在人家正是工人的神聖時間，要拿他去讀書，去看報，去補習技能，慰安靈性，非常的寶貴，那忍輕輕的把他拋棄呢？

凡是一個人靡有不願脫去黑暗向光明里走的，人生必須的知識更是引人向光明方面的明燈。不幸生在組織不良社會制度之下，眼看人家一天天安寧清靜去求知識，自己卻為衣食所迫，終歲勤動，蠢蠢的象牛馬一樣不知道人間何世，這種侮辱個性束縛个性的事，也斷斷非現在 *Democracy* 的時代所許的。因為 *Democracy* 的精神，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選舉，在經濟上要求分配平均，在教育上、文學上也要求一個人人均等機會，去應一般人知識的要求。現代的著作不許拿古典的文學專門去滿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，必須用通俗的文學，使一般苦工社會也可以了解許多的道理。現代的教育，不許專立幾個專門學校，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識階級就算了事，必須多設補助教育機關，使一般勞作的人，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個適當的機會去滿足他們知識的要求。戰後勞工生活改善的第一步，就是這種補助教育機關的設備，我們預知戰後

歐美的書報機關，必將愈益擴張愈益發達，勞工聚集的地方，必須有適當的圖書館、報社、專供工人休息時間的閱覽。英國這次社會改革的方案中也有改革村落生活的一條打算，各村均設一所大會堂，多設書報社，這真是應時的設施了。歐洲工人生活改善，而後必有新文明萌發於其中，象我們這教育不昌、知識貧弱的國民，勞工補助教育機關尤是必要之必要，望關心社會教育、勞動問題的人注意！

（1919年2月14、15日《晨報》，署名：守常。

選自《李大釗選集》）

李大釗：青年與農村

（1919年2月）

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，從根底輸到社會里面，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。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。

俄國今日的情形，縱然紛亂到什麼地步，他們這回革命，總算是一個澈底的改革，總算是為新世紀開一新紀元。我們要曉得，這種新機的醞釀，不是一時半刻的功夫，也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。他們有許多文人志士，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拋棄了，不憚跋涉艱難的辛苦，都跑到鄉下的農村里去，宣傳人道主義、社會主義的道理。有時乘着他們休息的時間和他們談話，有時和他們在一處工作，一滴血一滴汗的作他們同情的伴侶。有時在農村里聚集老幼婦孺，和他們燈前話語，說出他們的苦痛，增進他們的知識。一經政府偵知他們，或者逃走天涯，或者陷入羅網。在那陰霾障天的俄羅斯，居然有他們青年志士活動的新天地，那是什麼？就是俄羅斯的農村。

我們中國今日的情況，雖然與當年的俄羅斯大不相同，可是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里去，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，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，是萬不容緩的。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，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。他們若是不解放，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；他們的苦痛，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；他們的愚暗，就是我們國

民全体的愚暗；他們生活的利病，就是我們政治全体的利病。去開發他們，使他們知道要求解放、陳說苦痛、脫去愚暗，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，除去我們几个青年，举国昏昏，还有那个？

中国农村的黑暗，算是达于極点。那些賊官、污吏、惡紳、劣董，專靠差役、土棍，作他們的爪牙，去魚肉那些老百姓。那些老百姓，都是愚暗的人，不知道謀自衛的方法，結互助的团体。他們里边，有的是剛能自給的有土农夫，有的是厚拥田疇的地主，有的是專作农工的佃戶，有的是專待雇傭的工人。他們不但不知道結合起来，抗那些官紳，拒那些役棍，他們自己中間也是按着等級互相凌虐，去結那些官紳棍役的欢心。地主总是苛待佃戶与工人，佃戶与工人不但不知互助、沒有同情，有时也作自己同行的奸細，去結那地主的欢心。农村的教育机关，不完不备，虽有成立一二初等小学的地方，也不过剛有一个形式。小学教师的知識，不曉得去現代延迟到几世紀呢！至于那閱書報的机关，更是絕无仅有。他們一天到晚，只是到田园里去，象牛馬一般作他們的工；就是在吹風落雨，灯前月下时候，有点閑暇，也沒有他們开展知識修养精神的机会。从前的村落都有个寺院庙堂，他們也不会利用这些东西，作他們大家聚合的会堂，白白的看着他頹零在荒烟蔓草的田里。村落中也有比較开明一点，大家立个青苗会，在庙堂中覓个会所，也不过听那些会头們、紳董們一手处理，有了費用，就向老百姓們要；用去以后，全沒什么報銷。世界潮流已竟到了这般地步，他們在那里，还只是向人家要什么真主，还只是听官紳們宰割蹂躪，作人家的良民，你說可憐不可憐呢？推究这个緣故，都是因为一般知識階級的青年，跑在都市上，求得一知半解，就專想在都市上活动，都不愿回到田园；專想在官僚中討生活，却不愿再去工作。久而久之，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，都成了鬼蜮。农村中絕不見知識階級的足迹，也就成了地獄。把那清新雅潔的田园生活，都埋沒在黑暗的地獄里面，这不是我們这些怠惰青年的責任，那个的責任？

民主政治的精神进展的結果，擴張选举的声音逐漸增高起来。战后各立宪国，苟想把民主主义做到比前更加充实的地步，至少也要施行普通选举。我們中国將来的选举法，也不能漠視这种趋势，無論所行的是限制选举，抑是普通选举，那选民的生活本据，大多数都在农村。若想扩清选举，使这种新制度不作高等流氓們藏污納垢的巢穴。發財作官的

捷徑，非開發農村不可，非使一般農民有自由判別的知能不可。入民國，名義上也算行過幾次選舉，可是弄得污七八糟，幾乎把這個制度糟蹋的沒有一點本來面目了。根本的原因，就在農村中沒有真是農民伴侶的青年，告知他們那選舉的道理，備他們选出的人物。那些運動選舉的人都是來自都市，不是在都市中當過幾天流氓，就是在都市中作過幾天強盜，練習了許多的詭詐手段，積下了許多的罪孽金錢，却來騙他鄉里的父老。這些人都靠着選舉入了議院。立憲政治、民主政治，那有絲毫的希望？那些老百姓的生活上的疾苦，那能改善？生活上的幸福，那能獲享？立憲的青年呵！你們若想行個立憲的政治，你們先要有個立憲的民間；你們若想有個立憲的民間，你們先要把黑暗的農村變成光明的農村，把那專制的農村，變成立憲的農村。只要農村里有了現代青年的足跡，作現代文明的導綫，那些農民們，自然不會放棄他們的選舉權，不會濫用他們的選舉權，不會受那都市中流氓的欺、地方上紳董的騙，每人投的清清楚楚的一票，必能集中一個勤苦工作、滿腹和勞工階級表同情的人身上。他來到議院，才能替老百姓說話，也就是老百姓說話，他的話才能有無限的權威；萬一有種非禮的壓迫無端相加，老百姓才能作他們的後援。這樣的民主主義，才算有了根底，有了泉源。這樣的農村，才算是培養民主主義的沃土。在這一方面活動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義的工人。

現在有許多青年，天天在都市上漂泊，總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覓一個勞少報多的地位。那曉得官僚的地位有限，預備作官僚的源源而來，皇皇數年，弄不到一個飯碗。這時把他的青年氣質，早已消磨淨盡，窮愁嗟嘆，都成了失路的人。都市上塞滿了青年，卻沒有青年活動的道路。農村中很有青年活動的余地，並且有青年活動的需要，卻不見有青年的踪影。到底是都市誤了青年，還是青年自誤？到底是青年辜負了農村，還是農村辜負了青年？只要我們青年自己去想。

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們呵！你們要曉得：都市上有許多罪惡，鄉村里有許多幸福；都市的生活，黑暗一方面多，鄉村的生活，光明一方面多；都市上的生活，几乎是鬼的生活，鄉村中的活動，全是人的活動；都市的空氣污濁，鄉村的空氣清潔。你們為何不趕緊收拾行裝，清結旅債，還歸你們的鄉土？你們在都市上天天向那虛偽涼薄的社會求點恩惠，萬一那點恩惠天幸到手，究竟是幸福，還是痛苦，尚有一個疑

間。曾何如早早回到鄉里，把自己的生活弄簡單些，勞心也好，勞力也好，種菜也好，耕田也好，當小學教師也好，一日把八小時作些與人有益，與己有益的工活，那其餘的工夫，都去作開發農村，改善農民生活的事業，一面勞作，一面和勞作的伴侶，在笑語間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。只要知識階級加入了勞工團體，那勞工團體就有了光明；只要青年多多的還了農村，那農村的生活就有改進的希望；只要農村生活有了改進的效果，那社會組織就有進步了，那些掠奪農工，欺騙農民的強盜，就該銷聲匿迹了。

青年呵！速向農村去吧！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。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，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，那炊烟靄影，雞犬相聞的境界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！

（1919. 2. 20—23. 《晨報》，署名：李大釗。

選自《李大釗選集》。）

李大釗：工讀（一）

中國鄉村里有句俗話說得很好，就是“耕讀傳家”。現在家庭制度漸就崩壞，“傳家”二字已沒用了，可以改為“耕讀作人”。是一句絕好的新格言。

（摘自《李大釗選集》，284頁。）

李大釗：工讀（二）

現在世界上的工人運動，都主張縮小工作的時間。從前還主張八小時，現在有主張六小時的了。在我們懶惰的人看來，多以為省出來的時間，只是為休息休息，那知人家工作以外，還要讀書。省出來的時間愈多，就是讀書的時間愈多，使工不誤讀，讀不誤工，工讀打成一片，才是真正人的生活。

（摘自《李大釗選集》，285頁。）

惲代英：学术与救国

(民国十二年，1923年)

我害病三个多星期，許久不能为《中国青年》作文，实在抱歉得很。

我有許多要說的話，因为不能写字，只能想，不能說；可是又因为越想越觉得要說，所以今天托朋友代我写下这一篇来了。

我病中接着南京朋友效春的信，他有一段話說：《中国青年》頗得一般青年信仰，我亦希望能更多引人注意。惟望不要把学术看得太輕了，我們要希望多多注意国事，但不希望青年反对学术也。你有些話，不免故意过甚其辞，怕反对人失信用。

我接到他的信，觉得他或者有些誤会罢。我怎敢反对学术。我处处想从学术求得社会破坏建設中所应遵循的途徑，但我处处觉得材料不够用，知識太短淺了。我很恨从前糊里糊涂讀了几本不相干的書，完全未曾注意社会科学；我現在正想多用力研究社会科学哩！

一般人知道制造机器，駕馭汽車是不能不学的；若是沒有学这些事的人，偏要这些事，一定要被“行家”笑坏。但是很奇怪的，一般人对于怎样使社会进步，却以为不須学习，便都能說些不錯的話。所以一个大学者不敢討論木匠石匠的專門小問題，但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搖起笔来，便都可以談些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。無論是一个天文家，或者数学家，当他对公众演說的时候，除了說他本行的事情以外，都要自命为能談一点社会問題。所以大家都以为社会科学是可以不必学的，也因此大家終究不知道怎样使社会进步。

有些人說，中国是一定不会亡国的，有些人說，中国非亡国不可：其实兩方面都是說梦話。以为一国古老广大便可以不亡么？巴比崙，叙利亞的古老，印度的广大，却一个个都灭亡了。以为內乱外患便一定亡国么？苏俄的內乱，土耳其的外患，却都不能禁阻他們兴盛起来。一个国家要撥乱反正，轉弱为强，必定有他应遵循的途徑。我們要在社会学者

的理論中，古今中外历史的教訓中，去找出这种途徑，我們便能有把握地可以救中国。怎样能反对学术呢？

昨天又接着保定一位朋友中秀的信說：

有些人說，單單研究社会科学有什么用呢？不过只是做到破坏的工夫罢了，怎么能够建設呢？还是多多注意自然科学，以为將来的建設預备罢！無論怎样，自然科学是不能丢开不管的。象这样的論調，是最能迷惑人心的！有許多正在观望中的青年，都要受到他的暗示了！望你在《中国青年》上多多發表关于此类的文字，因为沉睡在科学救国的迷雾里的青年，实在不少呵！

我对于他这所說的自然科学，以为若是指的供給常識，造成丰富的人生兴味的中小学自然科学，我們并不必反对。但是象今天中小学沒有仪器标本，仅仅教授学生一些簡單枯燥的原理原則，使学生覺得比学古文还没有兴味，以为这种自然科学有什么用处，那便是笑話了。但这与社会的破坏建設沒有关系。

若所說自然科学是指的工業农業等技术知識呢，則我以为学这种技术的当然总比嫖賭学灵学和学白話詩的人要好些，我們也并不十分反对。不过我們覺得要救中国，社会科学比这些技术科学重要得多。

我在成都听見一个人很發感慨地說：“合成都各專門学校学生的学識，造不起一里鐵路，中国怎样会强呢？”哈哈，笑話！他以为合成都学生的学識造得起几里鐵路，中国便强了嗎？中国再沒有人，合全国东西洋留学生修几十里几百里的鐵路，总也沒有不能的罢。但是政府只知打仗，只知搶錢，只知逢迎外国人，全不肯用这些人做些事。在这种政府之下，在有几百几千个專門人材，也仍然找不着正經事来。他們怎能講什么科学救国呢？

譬如學習制造飞机的，中国也有譚根，厉汝燕，周厚坤等，但是中国何处有飞机厂可以請他們制造。他們若不是留在国外工厂，帮外国人制飞机，至多回国来只能做个駕駛飞机的人，或者甚至于在商务印書館里做些小小的工艺品。由此可見中国政治若是長此混乱，养些技术人材，終归无用。

現在全国工業农業的畢業生也不知有多少了，但是国内秩序混乱，百業不兴。这些專門学生仍只有去做官，去当土豪，去在一个設備不完整的学校里搶一个飯碗，結果把所学的一起忘掉，仍然同別的人一样，变

成一个光棍的流氓！我敢断言，第一是要社会有个改革，政治要比今天能上軌道，不然，多一个技术家，便是多一个流氓！全国專門大学一年要畢業几个学生，我为中国寒心呵！还講什么科学救国么？

要破坏，需要社会科学；要建設仍需要社会科学。假定社会是一个工厂，社会科学是工厂管理法；有能管理社会的人，一切的人一种技术，便得一种技术的用，沒有管理工厂的人，只有机械，只有象机械样的工人，技术家，工厂永远做不出成績来。

有的人要說，縱然有了管理工厂的人，仍然要技术家，这是不錯的。但是中国也有不少的技术家呵！倘若中国的技术家不够用，尽可請外国的技术家为我們服役。只要主权在我們，請外国的技术家，犹如外国招华工一样。即如現在德国的穷窘，設如我們向他們要技术家，真怕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美国日本从前都向別国請僱問請技术家，所以有今天。由此可知中国是政治上軌道要紧，技术家的够用不够用，还不成为一个重要問題。

中国政治上上了軌道，能够有足够的本国技术家，自然是再好沒有了的。我們并不反对入技术科学。但是我們以为單靠技术科学来救国，只是不知事情的昏話。越是学技术科学的人，越是希望有能研究社会科学，以使中国进步的人，好使他們可以用技术为中国切实的做事。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轉移以后才有用，他自身不能轉移时局，若时局不轉移，中国的事業，一天天陷落在外国人手里，縱然有几千几百技术家，豈但不能救国，而且只能掌他的技术，帮外国人做事，結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。所以，我們觉得要救中国，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重要得多。

（原載《中国青年》周刊第七期，1—4頁，中华民国十二年，十二月一日出版。）

惲代英：再論学术与救国

（民国十三年，1924年）

学术是一向被中国人胡里胡涂地尊崇的东西。一般愚弄讀書人的帝王，縱然在他‘馬上取天下’的时候，亦曾溺儒冠，辱儒生；一旦得了

天下，为着粉飾太平与消弭隐患起見，都不惜分点余瀝，用各种名位爵祿，把那些所謂‘学者’羈縻起来。一般白面書生，亦乐得与帝王勾結，以眩惑农工商賈，于是亦帮着宣傳‘宰相須用讀書人’一类的鬼話。因此，学术遂永远与治国平天下，有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关系。

我自問不敢鄙薄任何学术。無論科学亦好，玄学亦好，我每看見那些学者們連串的举出一些西洋的人名，以及他們能在各种書中举出各种的材料，不問他究竟學問深淺，我总永远的只有甘拜下風。我以为我們总应当服善，总应当服一切比我們有才能知識的人。我看見無論甚么唱京戏的，打大鼓的，变魔术的，我对他們都有相当的敬意；亦因为我没有什么比得上他。

但是我有一种偏見——或者是偏見罢！我想；倘若我害眼病的时候，我应当求唱京戏的为我疗治呢？还是請打大鼓的，变魔术的为我疗治呢？还是請科学家，（自然不包括医学家）或文学家，或玄学家为我疗治呢？我的偏見，以为他們都不配为我疗治眼病。我不是敢于鄙薄他們；但是我的偏見，对于疗治眼病这一層，他們一定是不配，一定是不配。你們以为我的話太不妥当了么？

由于同样的偏見，我想：現在中国的病象太复杂危險了，我应当希望一般人唱京戏来救国呢？还是希望他們打大鼓，变魔术来救国呢？还是希望他們研究科学，（自然不包括社会科学）或研究文学，或研究玄学，来救国呢？我的偏見，以为这些事都不配救国。我亦何曾敢干鄙薄这些事；但是我的偏見，对于救国一層，这些事一定是不配，一定是不配。你們以为我的話太不妥当了么？

我說要救国須研究救国的学术——社会科学，真有不少的朋友，以为是偏見呢！他們定要說任何学术都可以救国；倘若我反对了这句话，他們便要判我一个‘鄙薄学术’的罪名，我真太冤枉了啊！

* * *

我要正式申明的，我并不反对任何人，用任何目的，去研究任何学术乃至任何东西。世界上必須有种种色色的人，乃能成一个世界；这种事誰能够反对呢？我的意思，不过我們今天第一件事，希望真有些人能救国；因此希望真有些人能研究救国的学术。我第一是要指明，別的学术与救国沒有甚么直接的关系。靠別的学术救国，是靠不住的。第二是要指明，要救国仍非研究救国的学术不可，从前那种凭直觉盲动，是太

热心而没有结果的事。

不过我这种话，无意的研究竟侵犯了学术与治国平天下的神秘关系，究竟有一点排斥科学文学玄学于救国范围以外的嫌疑，于是终成了‘过激’的论调了。

然而我错了么？

* * *

亦许因为我不会说话的原故罢！许多朋友说，我要叫人家丢了他所学的一切，都来研究社会科学。其实我那里有这样的大胆呢？

我的意思，只是象下面说的几段话：

一、我以为要投身作救国运动的，应当对于救国的学术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功夫。我们决不只是发传单，打通电，开会，游行；闹了一阵，究竟闹不出甚么结果，便可以心满意足的，我们必须研究。然而我们在研究之外，在恰当的时候，用发传单，打通电，开会、游行乃至其他活动，以求达到一种目的，自然亦是应当的事情，这正如学理化的人，必须进实验室，是一样的事。

二、我以为我们定要打破任何学术都可以救国的谬想。我们要研究救国的问题，不可信靠我们自己数理，文学的知识，亦不可信靠那些大数理家，大文学家的议论。我们最好是自己能多少研究些救国的学术，而且从有这种研究的人那里，去得着相当的指导。

我以前只愿说救国，不曾说到吃饭的问题，我实在荒谬了一点。我们自然承认吃饭亦是一件重要的事，不能反对人家用任何技能去吃饭。因此，一般人学科学文学玄学来吃饭，谁应该反对呢？我们只愿请大家注意的，人怕不只是要为吃饭罢！你学科学文学玄学，你便可以吃饱了饭；然而你的亲友邻舍还是这样贫困窘迫，你以为这中间没有甚么问题么？再进一层，人怕不只是学了科学文学玄学，便可以有饭吃罢！倘若科学文学玄学便可以给饭人家吃，又那里有新派，旧派，东洋派，西洋派，南高派，北大派，这些抢饭碗的好听名词呢？

我以为要使一切人的吃饭问题都得着解决，要使我们自己的吃饭问题，得着永久安定的解决，我们非加入救国运动不可，所以亦非研究救国的学术不可。我们决不反对人家用任何学术去吃饭；我们所希望的；只是在吃饭的余闲，大家注意一点救国的学术。我们不要以为吃饭的学术便是救国的学术，不要欺骗青年，以为吃饭的学术，比救国的学术更

重要。

* * *

有的人說，我們研究學術，便是為的學術本身的价值，原不為他是否有用處，所以原不問他可以救國與否。這種研究學術的態度，我並不敢反對。人應當有順從他自己的意志，以尋求享乐的權利。而且中國要出幾個牛登，愛因斯坦，便會亡了國，滅了種，亦仍可以留存着他們萬古馨香的姓名。有時人家提及他們是中國人，我們亦還要分一點榮譽。不過我的偏見，以為這種榮譽，不享受亦罷了！我天天最感覺的，是這種貧困窘迫的慘狀；我總要想有一般人把這些事挽救過來。我只希望一般青年，多花些精神，研究挽救這些事間的學術，這似乎比那種個人的享乐，與虛空的榮譽更重要一點罷！

有的人說，便令研究救國的學術——社會科學，我們豈能完全離開別的學問？我們不懂生物學，便不懂人性，可以研究社會科學么？研究任何一種科學，離不了別的科學，這是不錯的。但是凡研究一種科學的，都有他研究的出發點。研究社會科學的，由他的出發點去研究生物學，便與本身是研究生物學的人，所持的研究的態度不同。實在說，研究社會科學的，若他不要自己改變目的，成為生物學家，他只是要利用生物學研究結果所得比較滿意的假設，以應用到他的社會科學研究上面。他固然可以因為他的高興，多做一番搜集標本或顯微鏡的研究；然而他要不能親身去做那種研究，他只是利用別個曾做那種研究的人，發表心得的書籍，亦夠了；中國有研究生物學的人與否，我們自己曾經象生物學家那樣態度去研究生物學與否，究竟與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前進，有什麼關係呢？

一切學術，都可以七灣八轉的使與救國發生關係，這是我承認的。但是沒有救國學術，而只有別的東西，終究永遠不能收救國的成效。倘若我們為研究救國的切實方略，一切學術都可以供給我們一些基本的資料；但是這不是說，我們應去研究一切學術，這是說我們應研究而接受他們所供給的那些資料，以供我們為社會科學的研究。倘若只有人供給這些資料，而沒有研究接受他們，應用他們以解決社會問題的人，我看這與救國，終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呢！

所以便令我們承認一切學術，都可以供給救國方針的資料；然而說一切學術都可以救國，然而說，中國人研究一切學術，是一樣的急切而

重要，究竟是靠不住的話。

然而一般青年竟被這些靠不住的話欺騙了。他們說，學校的功課都是一樣要緊的。他們的死用心，不但為混分數，而且也為的那些功課可以救國的原故。

（原載《中國青年》，第十七期，民國十三年）

惲代英：革命運動中的教育問題

（1924年1月）

自然現今談論教育的問題的文章很多。那些自命為“教育家”的，他們曾討論過格雷學制，曾經討論過道爾頓學制，曾經討論過設計教學法，智力測驗乃至於其他種種很新鮮的可以動人耳目的問題。於是乎得了一個結論，說現在中國的教育，比前幾年大有進步了。

只談教學方法，有這些種種色色的新花樣，若是一個公平的人，總不能不承認我們的“教育家”這幾年的努力，確實是有些成績，不過這些成績，對於中國今天的社會有多少價值，要另外做一個問題討論罷了。

若說教學方面要改良呢，教學的材料更有改良的必要。若說教學的材料要改良呢，訓育的方法與理論更有須商量的地方。比這更重大的，還有教育的目的問題。

但我們的“教育家”，不願討論這些“高遠”的問題。他們已經曉得，教育是要養成一般好人，養成一般好人，是要他們去改造社會。他們要承認在他們以前办的教育，除了很少的几个事例以外，並沒有養成好人，並不曾改造社會。不過他們決不懷疑教育的功效，他們說，這是由於办教育的沒有得着相當的人——這樣的一句話，坦白地翻譯出來，便是說，几千年办教育的都沒有得着“象他們这样相当的人”他們办教育竟能養成好人，改造社會，這件事他們很自信。

為了這樣的自信，他們能樂意去办學校，他們甚至於排擠別的人，

排擠了那些他們認為“不相當”的人，以讓他們好去辦學校。除了那些我們所不齒的教育家者流氓以外，確實有些人他們這樣做。只是出于純潔的自信心。不但新“教育家”中間有這樣的人。便是有些舊“教育家”他們亦是這樣想。

倘若他們真的辦了一所學校，他們要想種種法子，將學校办好。但是他們會遇見種種困難，他們的理想只能打个对折或四折的實現出來，甚至有些時候完全不能實現。在這個時候，他們若還是個沒有“經驗”的新畢業學生，他們亦會有一些不安的感覺；不過他們為生活起見，——他們不能不退讓一點。他們說，忍耐一下吧，這些理想不能一天實現的事。于是忍耐了下去。他們忍耐了一年，忍耐了兩年、三年，乃至七、八、十幾年，他們于是成了“老教育家”——便是成了老于事故的“教育家”了。他們于是乎望着新畢業的“教育家”笑，有時候他們因為和？新畢業的“教育家”太理想了，發起他們的氣來。新畢業的“教育家”因為這個原故，于是他們的理想，亦只好打个折扣或三四折的實現出來，甚至有些時候完全沒有實現。

他們的理想的环境不能完全實現，學生因而受不了完全的好教育，學生因而免不了有許多過錯，這一定是可以原諒的罷，不過“教育家”是要養成好人，改造社會，學生有了過錯，豈不顯然證明他們不能担負教育的責任么？他們是自負為空前絕後的“教育家”，他們的理想縱然不能完全實現，學生亦不应当便有过錯。他們恨學生的過錯，便令學生的過錯，他們自身亦不能免，他們還是恨學生的過錯。由于這個原故，他們勸戒學生，他們責罰學生。他們的希望，是要他們再也不看見學生的過錯。縱然學生還是免不了有过錯，至少要他們再也不看見。

然而他們的理想并不能完全實現，學生并不曾受了完全好的教育，學生因為過錯受了勸戒責罰，自然有些不很願意。學生因為對濫芋的教職員失了教禮，因為對於分配得太多的功課，不能預備得很純熟，因為對於規定得太煩苛的規則，不能遵守，遵守得很恭順，于是乎受了勸戒責罰，“教育家”以為這是救正玩忽囂張等惡弊必要的公平的处理。不幸有什麼“新思潮”來了，有一般“新教育家”因為要排擠“舊教育家”，到處鼓吹傳播那種“新思潮”，他們說，凡是無理的壓迫人的惡勢力都是應當推倒的。性情比較剛健的學生，比較急燥的學生，比較浮淺的學生，遇見了新思潮，象是炎日下的樹林遇見了野火一樣，他們要為他

們的利益奮鬥，於是乎哄教員，打校長，這名之為“學潮”來了，“舊教育家”趕急築起高的堤來，把一切可以進水的穴口都緊緊地關塞住，要使一滴水也流不進來。於是他們要開除學生，要去“害群之馬”。他們要保救那炎日下的樹林，他們拔去一切已經燃了野火的樹木，於是那些上了“新思潮”的當的學生失了他們的學校。

還有希奇的事情，有些時候，舊“教育家”的堤關不住了，“新教育家”駕着如山樣的潮頭撞了進來，於是學校里改了一翻局面。但是這樣的潮流，打得倒舊“教育家”，打不倒任何教育家遇見的種種困難，於是撞了進來的“新教育家”，又被那種困難包圍住。新教育家被“包圍”了，他們仍然不能完全實現他們的理想，仍然要勸戒學生，學生仍然很不願意。於是他們放的野火又燃起來了，他們從前視為利器的“新思潮”，把一切可以進水的穴口，都緊緊地關塞住，於是他們亦要開除學生，亦要去“害群之馬”。

這樣的結果，不是一批一批的新舊“教育家”被潮流洗刷了呢，便是一批一批的“害群之馬”累得這些“教育家”總要提心吊膽的謀對付的方法。於是學潮大多了，舊“教育家”說現在學生囂張得很，新“教育家”亦說，現在的学生也實在太囂張了。可見教育家無分新舊，見解究竟總是相差不遠啊！

於是新“教育家”亦老成些了。他們覺得學生的讀書與守規則，究竟比一切都要緊。他們從外國書本上，找了許多理論，說是教育要怎麼辦，學生便不待勉強，自然會樂於讀書與守規則。他們拿這些話到處講演。他們用這些理論翻過來，復過去的，在談教育的雜誌上做了許多文章。不過他們的見解，他們縱然因為種種原因困難，從來不能照着那些理論做，學生的讀書與守規則，究竟比一切都要緊。他們自己以為他們現在更穩健進步多了，這種穩健進步，更可見他們已經成了“大教育家”。

因為他們能□□□自己的言行不相符，他們又有十足的除“害群之馬”之力量，一般馴順的，愷弱的，雖然氣質不純，然而可以造就的青年學生，被他們那種氣魄與權利所攝服，居然大家拒絕了“新思潮”的煽惑，居然能安心地讀書與守規則了。於是這般“教育家”很自信的說，這嗎，要靠教育養成好人，改造社會，然而是有把握的多了。

他們的学生，於是乎很恭順，很靜默，居然“看不見”一點過錯，

現在他們已經养成了一大批这样“好人”。这样的“好人”腦筋里常常只有“分数”“升級”“事業”“教职員的喜怒”，这一类的观念。这一类的观念，亦很够的使他們成为“好人”。然而不幸的事，是这样的“好人”終究畢業了，他們現在再不需要分数，亦再无升学畢業的事了，教职員的喜怒对于他們亦不發生一点关系，他們現在已經出了牢籠了。从前那些不自然的对教职員的虛伪，对于他們沒再有一点必要。还有一層，他們現在有生活的問題。为了这些問題，他們必須拿从前阿諛教职員的声音笑貌，去阿諛軍閥官僚，乃至外国。再要对于一切可以惹危險的事，一律的靜默。再要对于一切可以給恩惠的人，一律的恭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縱然还有是非心的“教育家”，不再許他們是“好人”了，他們对于这般“教育家的批評已經全然置之度外。

于是这般“教育家”說，現在的人心坏了，在学校还是“好人”，一出学校便变到这样子。这般“教育家”虽然發了一頓感慨，然而他們还是自負他們是空前絕后的好“教育家”，他們的教育家，可以养成好人，改造社会。因此，他們仍是很乐意去办学校。

他們的学生还有畢業以后，居然不变坏的人。这些人无所謂好，然而已无所謂坏。他們很圓通，很和气，很能够看風色做事情。他們向来不出風头，总混在人堆子里过日子。他們也許是抱犢崗的一个走卒，也許是伪国会的一个猪仔，但是因为他們的名字，向来不惹人注意，所以人家亦决不指責他們。从古以来，只有孟子会描写这一等人，我抄他的几段話罢，孟子說：“何以是嚶嚶也？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，則曰古之人！古之人，行何为是踽踽凉凉？生斯世也，为斯世也，善斯为也，善斯可也，益然自媚于世也者，是乡愿也”。他又說：“非之，无举也。刺之，无刺也，用乎流俗合乎污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节，众皆悅之，自以为是，而不可与入堯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賊也”。你看他这所說好好先生的样子，以及那种很近“人情”的口調，簡直把現在許多中学，專門大学畢業生言行描写得淋漓尽致。这都是这些大“教育家”的成績。甚至于居然有些大“教育家”还要养成了几千或几百个随波逐流的学生，自詡为教育的实效。他們决不想这种“生斯世也”的精神，与改造社会有甚么关系。这些“生斯世也，为斯世也”的人，不是眼前惡社会的奴仆衛兵，他們处处为惡势力作瓜牙，但大“教育家”說，他們能够改造社会。畢竟大“教育家”有些出入意外的見解。